

毛泽东和他的



0009591

毛泽东之前的中国历史
走向权力

一个反抗者的诞生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造反者到统治者
延安时期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矛盾

分歧者

1966——1976

毛泽东的长江之泳
上海，一个激进的城市
武汉事件
“文化大革命”冲击香港
毛泽东对红卫兵采取行动
党的“九大”
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林彪的覆灭

衰落的年代

毛和周的对立面
政治钟摆的反复
权力斗争公开化

总体概观

毛泽东：神？人？或是怪物？
审判“四人帮”
毛泽东反对过的十个主要人物

[英] 克莱尔·霍林沃思 著
高湘泽 尹赵 刘辰诞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

[英] 克莱尔·霍林沃思著

高湘泽 尹赵 刘辰诞译

高泽湘审校

责任编辑 夏晓远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10.875印张 267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册

ISBN 7-215-00596-8/G·65

定价4.00元

译者序

“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因为，他的一生，曾经影响甚至主宰过中国的命运，并且今天依然对中国人民的理论和实践发生着重大影响。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杰出的领袖和代表，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理论家、战略家和政治家。正是在他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才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华民族才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国防事业各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也是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导致中国人民在某些方面付出了本该小得多的代价。总之，毛泽东的一生，“不论胜利和失败、贡献和错误、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①都密切关系到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关系到中国人几十年来的悲欢祸福，甚至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人格深层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难设想一部没有毛泽东的中共党史、一部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当代史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对毛泽东这位历史伟人一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和教训进行研究、总结，

^① 李锐：《关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载《光明日报》1989年2月2日第三版。

EG/12/05
就不只是一个具有史学意义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作为一位历史伟人，毛泽东一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和教训，是一个由多侧面、多阶段构成的复杂而又有统一性的辩证整体。对于这个整体，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人们既可以且必要做全过程、全方位的研究和总结，也可以且必要作阶段性和特定角度的研究和总结。如果为毛泽东作政治传记，那么，就可以且必要有“全传”和“侧传”之分：前者对毛泽东一生政治活动做全过程加全方位的考察、记述，它的长处在于全面；后者则只着重于考察记述毛泽东政治生活某个侧面的全貌，它的长处在于专门、详细。早在毛泽东同志生前，国内外就有了不少毛泽东政治传记类的著作，且不乏力作。但是，由于这些著作是在毛泽东生前成书的，因而客观上就不可能是对毛泽东一生政治理论和实践全程的考察和记述。毛泽东逝世后陆续出的一些同类传记，基本上弥补了这个“过程不全”的缺陷。不过，总起来看，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同类传记著作，大都属于前述的“全传”类。专门比较详细地研究或记述毛泽东政治理论和实践某一侧面的“侧传”，十分鲜见。比如，毛泽东与中共党内历次重大矛盾斗争（即毛泽东说过的所谓“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及我党我国人民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的关系，就是毛泽东一生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专门、详细、深入、科学地研究和记述这个侧面的全貌，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无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共党史，还是对于我们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显然都是一个亟需补上的工作。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翻译了英国女作家克莱尔·霍林沃思的这本《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

二

克莱尔·霍林沃思是著名的英国政治新闻作家，由于她首先报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新闻（1939年9月1日）而扬名于世。她长期担任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负责报导国际政治、军事新闻，曾多次访华。1973—1976年曾任该报驻北京记者，其间曾多次会见和采访过我党、我国高级领导人。作者现在香港大学任教，同时兼任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本书中，作者以一名记者的敏锐眼光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占有大量亲身采访的第一手资料并从有关研究毛泽东和中国问题的论著、文献中吸收大量有价值的资料的基础上，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生平经历、政策主张等方面分析了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观察、研究并叙述了中共党史上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它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毛泽东以及这段历史很有参考价值，至少它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一个较少偏见的外国记者是怎样观察、分析毛泽东以及这段历史的，从另一个侧面启发我们的思路。

综观全书，它最大的优点在于资料丰富，这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由于本书成书时间较晚（1985），因而使书中得以包括毛泽东之后中国人民对“四人帮”的审判材料，这无疑是本书优于它以前同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本书的另外一个优点在于，作者用以观察、分析、记述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比较科学的，态度也是比较客观的。这主要从以下三点体现出来。

第一，作者重视从毛泽东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和毛泽东当时当地所面对的历史任务来说明毛泽东的所做所为。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历次重大矛盾斗争中所充当的角色以及与其他当事人的关

系，不是象西方许多人和同类著作那样仅仅归因于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权力和意志，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去记述和分析。书中对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起因的分析和记述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除了权力等问题上的争执，除了毛泽东个人作风上在后期越来越不善于或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及中共党内实际情况的认识有误，在于由此错误认识产生的善良而又根本不着边际的使命感。作者指出，当时毛泽东认为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特别是在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层内部，“正在形成”一个政治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工作作风上官僚主义、个人生活上腐化蜕变的“特权阶层”，认为中国因此正面临着象苏联赫鲁晓夫时期那样“变修”的危险，为了“挽救革命”，必须通过有全国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政治大动乱，来乱掉这个“特权阶层”，推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认为这样的政治大动乱应该每隔七、八年就来上一次。作者的这种看法，与我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这对一个西方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再比如，毛泽东建国后在国家行政管理与国民经济发展等问题上曾有过一些错误见解，并基于这些错误见解而错误地批判处理过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如彭德怀、刘少奇等）。在本书作者看来，导致毛泽东这些错误的，主要也是思想认识根源而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至于具体的思想认识根源，作者认为是由于毛泽东头脑中缺乏用经济手段管理社会和国家的观念，并且由于毛泽东本人对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当代世界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作者还认为这同毛泽东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个人阅历和知识面不够宽广有关。例如，作者指出：“对如何用经济手段管理国家明显不感兴趣，这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毛泽东后来犯错误的原因。之所以如此，无疑与他拒绝出国有关，而且与他压根儿就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有关。”根据作者在重大问题上的比较科学的见解，毛泽东与其他当事人的矛盾斗争不是什么个人权力之争，而是一种革命家责任感的矛盾表现。

第二，在对毛泽东以及其他有关当事人的个人功过是非的评价上，作者的看法也体现出历史地客观地观察问题的方法。作者一方面直言不讳地指出毛泽东的失误（如建国后没有始终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国家经济、文化、国防和民主政治建设上，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急躁冒进，“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以及在接班人问题上对林彪、“四人帮”的轻信、误用等等），另一方面又比较如实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如在最后的总结中，作者认为：“作为一个伟大的叛逆者，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老的游击战思想，用之于20世纪的中国，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使之适合于他那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政治纲领。因此，他的名字无疑将永垂不朽。他推翻了腐朽的蒋介石政权，使四分五裂的中国重归统一，因此，毛泽东还将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世人们心中。”另外，作者对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彭德怀等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巨大贡献，对他们卓越的智慧才能和优秀品格都表示了对钦佩和肯定的态度，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则表现出明显的贬斥和厌恶。

第三，作者科学的、客观的记述和分析告诉我们，凡是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主张符合中国国情，能够竭诚团结、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取得成就和发展；反之，凡是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主张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领导者个人专断，把别人与自己在某些思想、政策乃至工作上的分歧轻率武断地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动辄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批判斗争，就必然破坏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从而造成决策的重

大失误和混乱。在作者着重记述的建国后的这段历史中，这一点表现得比较明显，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性的大动乱，更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

在肯定本书的价值和长处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它是一本权威的有关毛泽东的论著，更不意味着我们毫无保留地赞同书中的所有观点。本书作者是一位记者，而不是一位政治学家。在本书中明显表现出记述优于分析；在记述分析中有时显得感情胜于理智。书中的有些材料、有些表述，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这种局限性。这不仅表现在作者掌握的一些材料中对人物、事件、地点、时间缺乏考证，多有不准确之处，而且更表现在作者比较热衷于“传闻”，掺杂“传闻”对某些问题加以联系、推论或推测，这便使本书的可信度打了些折扣。这种局限性不仅造成了本书一些细节上的错误，而且使得作者对某些大的事件产生整体性的偏颇。如对高岗，作者只是着重强调中苏矛盾和对国内工业管理体制上的意见分歧，而忽视乃至无视许多已知的可信材料，只字未提他的非组织活动。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明确指出，但同时也应说明，只要作者不是蓄意编造或歪曲，我们也不必苛求。对于书中具体叙述失实和不准确的地方，我们尽可能加了注解。但是尽管如此，可能还有些尚无定论的问题和我们没有发现的不准确之处，这些还需要细心的读者注意分析、鉴别。

高湘泽 一九八九年二月

前 言

我的中国朋友曾不无惊惧地对我说：有许多人因为同外国记者及外交人员交谈而遭到囚禁。这位朋友是中国政府的一位官员，我们的谈话，后来被当作“查塔姆宫章程”(Chatam House Rules)在伦敦广泛流传。参与那次座谈或访问过那次座谈会的人，只要不透露在那次座谈中提供消息的人的名字，都尽可以利用从那里得到的消息。

不少记者在访问北京回国后，靠背叛他们的采访对象而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一提到这样的记者，我的中国朋友就恨得咬牙切齿。其实，和现在一样，大多数中国人以往在与他们那些“好奇的”朋友们谈话时，一直在谈话内容上很谨慎。不过，偶尔也有那么一些时候，当政治和人身迫害加剧时，他们也会变得无所畏惧。1976年上半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正是周恩来总理在元月份逝世之后、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前——这次地震预兆了同年9月份主席久病缠身的状况结束。

许多人当时都想告诉外国人有关邓小平第二次遭贬的内幕：邓这次遭贬，是早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清明节示威活动之前就发生了的事。在那次示威中，示威群众高度颂扬已故的周总理，对邓小平报以热烈的拥护。我的中国朋友们当时几乎都相信“四人帮”将在毛泽东主席去世后取而代之。他们说，江青当时实际上已经开始使用主席的手章和印玺——这种印章，在中国被视为象西方的签名一样具有权威性。

我的这些中国朋友诚恳地表明：他们希望全世界都了解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在内政外交上曾起过多么明智、多么有远见的作用。他们担心周总理的支持者会在邓小平遭贬之后受冷落或境遇更惨。有些人因此惶恐不安。记得有一次夜里，我在一个秘密地点冒着寒冷等待和一位朋友碰头，结果他未能按时到来。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一些惊人的消息，这些消息有不少都在随后对“四人帮”的审判和其他事件中得到了证实。

无疑，1976年，摆脱了禁锢的舆论担心林彪这个“叛国贼”早先与苏联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是20世纪30年代林彪在苏联停留的那三年半中建立起来的。许多人认为，直到1971年林彪军事政变失败为止，林彪与苏联的秘密联系从未间断过，而且还偶有小阴谋活动。这些阴谋家以为，当他们从南边发动进攻、在南京另立中央的时候，苏联人会从北边与他们配合，夹击中国。

江青拍摄的一张照片，暴露着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林彪的秃头。这张照片向中央委员会和外交使节们透露了这么一条信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关系已经全僵了，因为除了擦额头上的汗，林彪是从不摘下头上的军帽的。在人们的心目中，江青是一位肆无忌惮、恣意妄为、权欲极盛的女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的人们，早已对她深恶痛绝。

在毛泽东的晚年，他一直为那十个领头反对他的人感到恼火，他认为这些人领导的反对他的运动是有预谋的、以破坏他的政治和人事权力为目的的。他经常提到“有关我们的路线问题的十次斗争”——其实，这些“路线斗争”，不过是在有关的政策和领导问题上的重大意见分歧而已。

我在本书中，都是用现在中国人通用的汉语拼音方式来称呼中国人物的，只有少数人名地名，对外国人来说用以往的拼音比用汉语拼音更熟悉些，所以未使用汉语拼音方式，而沿用英文拼音方式，例如北京——“Peking”，香港——“Hong Kong”，

孙逸仙——“Sun Yat—Sen”，以及蒋介石——“Chiang Kai—Shek”。

许多人在翻译方面为本书提供了帮助，也有人对本书原稿的修改提出过建设性建议。在我原先驻北京的日子里，驻华大使、已故的约翰·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曾给我以极大的关照；事实上，他的僚属们对我亦是如此。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已故大使，首任驻北京联络官)和他的夫人伊万杰林(Evangeline)和他的继任者、美国现任副总统(“现任”是指作者写此书的时间。本书中译本与读者见面时，原先的副总统已是总统了——译注)乔治·布什(George Bush)，这些人都给我以很大帮助。法国驻华大使、加拿大驻华大使，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阿尔及利亚、伊朗等国的驻华大使，也都不吝赐教，与我交换看法。而且在交换中，他们给我的帮助比他们从我这里得到的观点要多得多。

当我不在中国工作的时候，伊丽莎白·赖特(Elizabeth Wright)和大英中国中心的官员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自从1981年年初来到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工作以后，爱德华·陈博士(Dr Edward Chen，研究中心主任)和S·S·K·秦先生(S·S·K·Chin)都为我提供了难以估价的咨询和帮助；历史系的玛丽·特恩鲍尔(Mary Turnball)教授和罗斯玛丽·奎斯泰德(Rosemarg Quested)博士同样如此。香港前总督、现在的麦克尔霍斯勋爵(Lord Maclehorse)、副校长雷逊·黄(Rayson Huang)博士，也给我以鼓励和帮助。

我由衷感谢帕梅拉·蕾蒂·埃格丽蒙特(Pamela Lady Egremont)。在我长期旅居中国的时候，她向我提出过许多精明的劝告，为我作了坚韧而耐心的工作。对于伊莱恩·罗布森—斯科特女士(Mrs Elaine Robson—Scott)，我也由衷表示感谢，她不辞辛劳，帮助校正了本书的一些证据。我在中国国内外的许多

同事和朋友，也曾慷慨赐教。其中包括尊敬的威廉·迪兹爵士（William Deeds，〈每日电讯报〉编辑）和他的同僚。自不待言，书中的结论是我自己的结论，与上述这些杰出的学者、记者和外交家们无关。

导 论

——毛泽东之前的中国历史

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大约比埃及历史晚500或600年，大致与古代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化的兴起同时代。的确，华夏民族是最先在黄河流域制作无孔上釉陶器的民族。而且几乎和埃及人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尼罗河边的沙漠上修筑金字塔同时，华夏民族就已发明了日历。但是，除了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之外，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封闭性也是举世罕见的。

中华民族自称已有4,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且在公元前221年的第一位皇帝统一华夏之前，就已在文化和教养水平上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用畜力耕田是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的事，与此同时，也已开凿了许多运河以利贸易和“占领”人口。这些运河的开凿最后又造成灌溉之利，并使更广阔的地区得以农垦。

在军事技术方面，铁器的使用比欧洲早了1000年。石弓的发明在中国也比在西方早了几个世纪。

最著名的中国学者之一是孙子，他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曾写过一系列兵法论著。孙子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日本的军事思想亦影响颇深。他也是毛泽东战略理论的基本来源之一。孙子的学说认为：作战包含着远比士兵之战更多的因素；战争中的道义、理智和环境因素，远比肉体因素重要得多。他告诫“君王和统帅们”不要单纯依赖军事强力。

孙子坚信，最成功的将军是那些从不无的放矢的将军。他认

为“虚张声势”的作法是军事行动之必不可少的伴随物，而且还勾画了一套有关心理战的纲要性理论。

在孙子生活的年代，就已经有一些小国家开始修筑长城，以此作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秦朝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公元前210年在位）把这些零散的防御工事中的某些段落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道连续的屏障，它东起渤海之滨的山海关，西至黄河的弯曲处，西南延伸到兰州。到了汉朝（约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又把长城西延到新疆省境内，为在中亚进行军事竞争提供根据地，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保障他们的移民、粮仓和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最后，也可能是最主要的长城修筑者，可能是明代的皇帝们（公元1368—1644年）。

另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是孔子，他比孙子稍晚些，生于公元前552年。孔子对中国的影响，恐怕比其他任何一位个人对中国的影响都大。自从被从他的国家鲁国（今山东境内）驱逐出来以后，他率领他的门徒周游列国，宣扬封建原则，竭力把这些原则制成一种有关“社会公正和和谐关系”的哲学学说。他到处鼓吹他的伦理价值准则，特别鼓吹要人们尊敬国君和家长。孔子直到临死生活都很贫寒，他的一生无疑是失败的一生；然而，他死后却常常被人们尊为不戴皇冠的中国帝王。他的说教在他死后一直对中国社会发生着影响，甚至在20世纪的中国，仍然在发生着影响。必须强调的是，孔子的儒教是一种伦理和政治思想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人神之别、俗教之别及政教之别。

道教在对中国的影响上是仅次于儒教的第二大学说。它产生于公元前479年孔子死后不久，但直到公元前3世纪传说中的老子写下《道德经》，道教才有其文字记载的史料。它的核心原理就是“无为”；同时，由于它呼吁人们返回大自然、返朴归真，所以对儒教起了一种抵销作用。自古以来许多有教养的中国人都并不认为儒道两种学说势不两立。许多官吏在官场上是儒教信徒，

回到家里则成了笃信道教神秘说教的人，企图与天同道。在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上，道教对国家政事很少影响，但却对中国的诗歌和绘画影响深远。

当欧洲文化逐渐发达并从希腊转移到罗马和西欧时，中国则因为受海域和“蛮人”的包围而与外世隔绝。确实，直到大约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丝绸被带到希腊为止，此前的中国一直是闭关自守、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相往来的。

用中国古代的平底船运出来的丝织品，有的被送到了波斯湾，有的通过位于现今婆罗洲或仰光的原始驿站而抵达红海。随后再被销往亚里山大里亚港或土耳其港。但是，从公元前1世纪直到罗马帝国的覆亡，只有帝国中的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们才穿戴丝绸。另外，相当大一部分贸易品和一些好学的旅行者，都是从陆路上通过波斯，取道阿富汗，穿越通往吐鲁蕃、兰州和西安的沙漠跨越亚洲的。也有人由于地方条件的原因，通过其他种种途径跨越亚洲，如有些人走到了喜马拉雅山以南。

与拜占庭的丝绸贸易，是在公元552年因当时某个僧侣或更可能是一批僧侣、工匠和商人设法把蚕偷运出中国而衰落的。最流行的传说中说有一位教士把蚕卵藏在空心十字架中带出了中国。但是，这些珍贵的生物也可以被藏在瓷碗中或夹在皮革中被带到罗马。

在此之前，佛教已传入中国，最初是通过商人、随后又通过僧侣们经由丝绸之路将其传入中国。当时大约是公元初年。佛教从乔达摩（即释迦牟尼——译注）的学说中发展而来。乔达摩生活在印度北部，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寺庙，为旅行者们提供了遮风避雨之所；下榻这里的旅行者，利用佛寺从事商品交换，用实物或黄金换取当地的通货。此外，诚实的和尚还为那些将从事危险跋涉的旅行者们寄存金钱财宝。所以人们现在称丝绸之路上的和尚是“国际金融业之父”。

到公元4世纪时，佛教已不仅成为中国艺术生活中的一个很活跃的部分，而且成为中国宗教生活中的一个活跃部分。这种状况最初在北方特别突出，随后又传延到南方。公元8世纪是佛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期。它迎合了民众日益增长的对来世生活的希望，同时又使他们的现世生活具有虚饰的壮观。另外，僧侣们还会行医治病。佛教给妇女以男女平等的说教，因而它又自然会鼓起广大女性的信念，因为她们已对孔夫子有关家庭中男尊女卑的说教感到厌烦。

虽然基督教徒也曾涉足丝绸之路，但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引起过许多宗教皈依现象的却是在公元6—7世纪间传入中国的叙利亚景教徒，例如西安博物馆中的石碑就记载了这一事实。基督教实际上是在公元841—845年间的宗教迫害时期被驱逐的。

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其中包括在公元660年左右引进的铁索桥建筑术，使得唐王朝（公元617—906年）能够实行扩张。历代唐朝皇帝征服了包括朝鲜在内的整个满洲，征服了新疆，甚至渗入西藏，西藏的王子就曾“娶”了一位大唐夫人。

在整个以往的中国历史中，皇帝都具有神圣的权利。皇帝是“天子”，他死后将“乘龙车去天上作客”。每逢干旱或水涝灾害，他就命其大臣们去祭天。而且，尽管在漫长的世纪中也有些例外情况，但总的来说，皇帝也允许他的臣民保持他们对佛祖的崇拜和信奉道教或甚至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只要这些信仰活动不越出宗教事务的范围。

只有一位女人，即唐王的遗孀、女皇武则天，曾经使用过“天女”这个称号，而且从公元684年到公元705年一直统治着唐帝国。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在传统上都反对妇女当政，因此，霍齐亚·莫尔斯在1907年写道：所有的编年史家们都争先恐后地往武则天身上倾泼污水。

在公元前2世纪初，汉朝的第一位皇帝的皇后就曾经在皇帝

在位时起过重大作用，并对他那傀儡儿子的行政事务起过重大作用。事实上，她当时控制了整个帝国。据说，她控制国事所用的方法与皇太后慈禧太后控制国事所用的方法一模一样——这位慈禧太后的当权时间恰好大体上与维多利亚女王当政的时间平行。

在历代中国王朝中，唐朝是很少几个对外国人持欢迎态度的朝代之一。它的首都长安——即当今的西安——成了来自阿拉伯、波斯和叙利亚的学者们聚会的场所。第一位来华的基督徒就落脚在西安。另外还有许多外国来客，比如印度的魔术师、骑马或骑骆驼的杂技演员，等等。事实上，在公元8世纪，西安已有4000多个外国家庭。

公元845年，朝廷突然惊觉到：为数众多的僧侣最终可能对中国的社会基础本身造成威胁。因为朝廷担心会有太多的人为逃避兵役和官差而遁入教门。于是，在事先未加警告的情况下，有4,500座寺院遭到破坏，260,000僧人和尼姑一夜之间被迫弃教还俗。外国侨民遭驱逐，来访的外国人也都受命返回本国。

公元9世纪更重要的发明是火药的使用。火药的发明最初在公元850年左右，尽管直到公元919年火药才被用于军事。起初是把火药制成手掷弹或炸弹，靠抛石机来发火。后来火药被改造成适合许多种发射器发射。在此期间，中国还发明了西方人不曾知晓的武器系统——即弓弩炮，其构造是在一辆车架上绷有许多弓弦，可以同时发射许多支箭或弩。中国古典文学、中医药事业及数学研究，在初唐时期也同样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宋朝——它是在唐朝灭亡、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动乱后出现的一个朝代，发展了茶叶种植业，改进了瓷器制作技术。在宋朝时期，文学和绘画不仅在达官贵人中间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商贾和初生的资产阶级那里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然而，宋朝从前人手中继承下来的坚船利炮，并未能使宋朝